

历史性的机遇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当代中国

吴伟赋

—

哲学史上有这样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某种具有创新性的哲学往往都会有一种生不逢时的命运，其价值总是要经许多年后才被人们发现和承认，比如西方的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中国的老庄哲学等，这种现象令人扼腕叹息。深究这种现象形成原因不是本文的主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对于当代哲学家来说，不仅要创造伟大的哲学学说，还要善于发现适合这种哲学生长的土壤。只有这样，才能使哲学更快地发挥指导现实的功能。幸运的是，本文所讨论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就是符合这种时代要求的新哲学。它不仅提出了以英籍美国哲学家怀特海过程哲学为基础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而且独具慧眼地发现了适合其生长发育的土壤，那就是正在探索新型现代化之路的中国。

我们知道，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产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克莱蒙（Claremont）。它是继解构性后现代主义之后出现的一种最新的哲学思潮。这种哲学从反思现代性恶果出发，致力于构建一种不同于

现代世界观的、有机的、整合的后现代世界观和思维方式，从而为人类超越现代性、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后现代世界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但是任何优秀的哲学总是具有超越现实的品格，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也不例外，而且它又恰恰产生于现代性最发达的美国，西方社会制度的局限，现代思维的根深蒂固，以及现代以分门别类为特征的大学教育体系，使得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迄今为止尚未成为西方哲学和世界哲学的主流。但是，非常可贵的是，胸怀为人类及其他所有生命共同福祉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并不止步于此，他们以敏锐的目光、深刻的洞见、强烈的责任意识、身体力行的持续努力，仅仅通过短短 18 年的时光，就让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中国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开出了走向后现代社会的希望之花。

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18 年前的中国，即使是哲学界最顶尖的一流学者也不熟悉“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这个由格里芬先生首创的这一哲学名词。因为我是 1997 年考上浙江大学外国哲学博士研究生的。当时国内所有的有关西方哲学教程皆没有提到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如我的导师夏基松先生当时的新著《现代西方哲学教程》，就没有讲到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直到 2000 年我完成以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为主题的博士论文时，导师还曾为请谁审阅论文而犯愁，这说明当时确实国内鲜有人知道和了解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先生也承认自己“更多地关注怀特海和后现代主义是到 21 世纪了”。^[1]但是，时至今日，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你只要在百度上输入关键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就会发现与此相关的结果会高达 673 000 个，谷歌上则高达 1 430 000 之多。格里芬先生的名言：“中国可以通过了解西方所犯下的错误而避免现代化恶果，当中国这样做时，就已经是后现代化了。”^[2]这一名言现在被中国学者广泛应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由此

[1] 汤一介：《第二次启蒙》序言，王治河、樊美筠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1 页。

[2] [美] 大卫·格里芬：《科学魅力的再现》中文版序言，王治河主编，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 年，第 13 页。

可见，近些年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势头。

二

让我们具体地描述最近 18 年来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生长与发展轨迹，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所希望的后现代化中国正在破土而出。

变化之一：中国的理论界、学术界的变化

从上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开始传入中国。其标志是 1995 年大卫·格里芬博士的《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一书在中国正式翻译出版（至今已第六版）。经过将近 18 年，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已经对中国理论界和学术界产生了非常明显的重大影响，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应用都呈现了良好发展的态势。这种影响，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著名学术精英、主流研究杂志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之于中国的重要性等问题有了清醒而正确的认识。但客观地说，这一认识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正如中国社科院一份题为“走向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报告说：“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学术界对后现代主义的态度有一个从否定到肯定的变化过程”。^[3]但通过中美各方不断的努力，中国学术界已经达成以下共识：一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对中国有重大价值；二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根本不同于否定性后现代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另一向度；三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有着有机内在的联系，两者共通。正是在这三种共识的基础上，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迅速成为中国学术界研究重点之一。

正如北京大学著名国学家汤一介先生在《文汇报》著文说：“当今中国学术研究有两个焦点，一是传统国学研究，二是建设性后现代主

[3]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通讯》，2003 年 4 月 15 日。

义研究，这两者如果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生根发芽、快速发展，那么中国就可以迅速完成‘第一次启蒙’，并迅速进入以‘第二次启蒙’为旗帜的后现代社会。”^[4]《中共中央党校学报》、《哲学研究》、《哲学动态》、《自然辩证法》、《国外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上海浦东干部学院学报》等学术杂志陆续发表著名专家关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成果；主流媒体如新华社、《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教育报》、人民网等也纷纷积极报道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各种学术活动。一些大学如浙江大学等甚至把格里芬、柯布等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大家的代表作列为研究生必读书目。

其次，关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成果数量上不断增多、质量上不断提高。这种研究成果一是以专著的形式出版，二是以研究性论文的形式发表。综观这些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研究的内容非常广泛（例如哲学、比较哲学、政治、教育改革、生态文明和后现代农业等），几乎涵盖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的所有领域。据《中国有机哲学 85 年》一文作者不完全统计，2001 至 2010 年间，有关过程哲学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研究成果快速上升，共出版相关专著 180 部、发表论文 255 篇。

第三，中美学者相互交流的平台与机会不断增多。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大本营美国过程研究中心与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的支持下，本着自愿的原则，迄今为止，已在浙江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 22 家中国著名高校成立了过程哲学或后现代研究中心，已经翻译出版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著作多达二十余种。各种关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国际学术会议、高级学术论坛、学术讲座也不断增多。其中 2002 年在北京召开的“过程哲学与价值哲学——怀特海与中国”大型国际研讨会影响最大。二百多名中外学者参加此次大会交流，中国教育部袁贵仁部长还到会作了重要讲话。此外，有

[4] 汤一介：《论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传统文化》，《人民日报》，2005 年 2 月 4 日。

三十多位学者则以访问学者的身份直接到美国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大本营克莱蒙大学学习。他们回国之后，或著文、或宣传、或实践，使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大有成为一门显学之势。现在的中国学术界，很少有人不熟悉像格里芬、柯布这样的建设性后现代大家的，而这在18年前是不可想象的。那时的学术界关注的是德里达、福柯这样的解构性后现代主义哲学家。

变化之二：中国政府高层决策取向的变化

或许是因为改革开放30年来实现现代化所付出的代价太大，或许是因为中国特殊国情所决定，立志走中国特色现代化新路的中国政府高层特别关注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特别是环境、生态和能源等与现代化密切相关的问题。这样一种决策取向就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所推崇的整体有机论、多元文化互补论、生态和谐平衡论和创造性人生等诸多主张不谋而合，使得中国政府高层的决策有意或无意地显示出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及其思维方式的兴趣、关注和接受。正如国家宗教事务局政法司副司长裴勇所说：“作为一个事实，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应用了后现代的想法。”^[5]以2005年温家宝在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演讲和2006年胡锦涛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为例。温家宝说：“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文化多样性就如自然生态多样性一样是一个客观现实。”^[6]胡锦涛说：“一个作曲家无法用一个音符表达出优美的旋律，一个画家不能用一种颜色画出美丽的风景。世界文化是一个由各国人民独特创造而汇聚起来的宝库。”^[7]这两位中国最高层前领导人的讲话都强调了对多样性的推崇，因而充满了明显的后现代气息。最为明显的是中国政府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提出以及民间百姓的自发行动。因为人们意识到：“如果我们这

[5] 裴勇：《为什么是中国？中国对后现代运动的意义》，《过程研究》，352卷，2006年，第359页。

[6] 温家宝：《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演讲》，2005年12月5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05-12/07/content_3886424.htm

[7] 胡锦涛：《美国耶鲁大学演讲》。<http://www.mfa.gov.cn/eng/zxxx/t259224.htm>

个物种和其他所有物种想要继续在这个星球上生存和繁荣的话，生态文明的建设就是迫切需要的。”^[8]因此像“硬发展没道理，可持续发展才是硬道理”、“既要金山银山，更要青山绿水”等后现代理念已经成为当今中国人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共识。浙江宁波市百姓自发联合呼吁拒绝污染生态环境的石油炼化项目，表明了百姓自发的环境保护意识。而浙江省开化县为保护钱塘江水质，明令禁止上马任何影响生态环境的工业项目则表明了政府在环境保护上的政策走向。

事实上，中共在十七大时就已经把“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近日刚刚召开的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9]这段话中的后现代气息已经非常明显了。所有这些都很好地表征了中国正在不断地走向后现代化。

变化之三：中国教育界的变化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也许在中国教育界表现的最为明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国的现代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几乎都沿袭了西方的教育理念与模式。但这种模式现在出现了很多问题，这就迫使中国教育界寻求改革创新。尽管主流的西式教育模式现在尚未得到真正的改变，但中国教育创新改革的探索从来也没有停止过。特别是最近10年，随着社会对高素质的综合性的有道德有责任人才的需求，随着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特别是怀特海过程教育思想与中国教育改革的相遇，无论是基础教育领域还是高等教育领域都出现了令人欣喜

[8] [美]大卫格·里芬：《生态文明与马克思主义》序言，载李惠斌等主编：《生态文明与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9页。

[9] 《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工作报告》见网址：

http://news.xinhuanet.com/18cpnc/2012-11/08/c_113637931.htm

的变化。《中国有机哲学 85 年》一文作者认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朱小蔓、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裴娣娜是怀特海教育思想和有机哲学在中国教育领域研究与应用的领军人物。正是因为以她们为代表的教育界人士积极努力，后现代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中的应用与研究才不断地走向深入。

如高等教育开始注重自主招生，强调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科专业开始整合，强调各专业的融合沟通，如北京大学文科不再细分文史哲专业，而是使之整合起来，待学生具备一定的基础后，再自主决定以后的专业方向。再如中国的现代远程高等教育，其教学设计、教学方法、教育形式都十分注重运用后现代教学思想和后现代课程观，特别强调学生学习的合作性、自主性与创造性，强调知识的实际应用，培养学生综合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

变化之四：中国现代农业的变化

农业也许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为重要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客观地说，改革开放 30 年，农业为中国现代化作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使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的粮食问题得到了完全的解决，但代价也非常巨大。主要表现在农村土地的严重污染与农村社区生活的严重破坏。幸运的是中国政府不但深切地发现了这一问题，而且已经开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后现代农业之路。事实上，在后现代农业这一全新的理念传入中国前，中国各地就有结合环境保护开展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绿色农业的尝试，其产品也很好地迎合了人们对食品安全的强烈需求。

但总体而言，这种探索的发展思路还不是很清晰，规模也有限，且大多集中在果木等经济效益好的产品之上。随着建设性后现代农业思想的传入，人们对如何更好地发展中国现代农业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发展思路也大大开阔了。这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以及国内相关人士的努力是分不开的。2008 年 7 月在山西省太谷县召开的“后现代（生态）农业与西部开发”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是这种努力的

一个很好例证。此会由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与山西农业大学共同主办。这次会议达成很多共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后现代（生态）农业理论为我国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有利于解决目前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了澳大利亚“绿色澳洲”项目主任弗罗伊登博格（David Freudenberg）的大会发言“中国应走后现代农业之路”。此文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后现代农业实践正式开始。此后，一大批运用后现代农业理念的农业实验区相继出现，如四川大坪村的乐和家园，山东弘毅生态农场，浙江奉化滕头村等。我们坚信，随着研究和探讨后现代（生态）农业的理论和方法的不断深入以及对国外先进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借鉴与创新，富有中国特色的后现代农业之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变化之五：百姓生活方式的变化

现代化之初，很多普通中国人盲目追求西方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等现代生活方式，结果很多人发现物质丰富了，精神却反而空虚了，身体健康也不行了。无数惨重的教训迫使人们清醒并开始改变生活方式，讲究生活质量，注重精神生活，过度消费、无端浪费被视为耻辱；食品讲究自然有机，邻里以和为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美德不断发扬光大；城市社区生活不断丰富，平时讲究中医养生，积极运动健身，整合调理身体，拒绝不健康生活方式、实践绿色生活方式已经成为普通百姓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所有这些变化是令人激动和自豪的，它表明：一种新的建设性的思维方式和建设性后现代化之路正在中国不断地推进。这里可以借用格里芬先生的一句话：“当中国这样做时，中国已经是后现代化了。”^[10]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推论：一个后现代化的中国已经破土而出。

[10] [美] 大卫·格里芬：《科学魅力的再现》中文版序言，王治河主编，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3页。

三

事实上，放眼当今世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与作用正在不断地增长，它很好地显示了其旺盛的生命力。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证实这个判断。

一方面，从西方世界看，随着现代化不断深入，现代性之局限及其所带来的恶果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因为现代性所带来的诸如生态危机、社会危机、信仰危机已经成为一个超越国界的全球性问题，西方世界想独善其身根本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超越现代性从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也就自然成为西方世界所不得不完成的一个重大任务。这就促使解构性后现代主义或否定性后现代主义产生。它彻底消解了人们对作为现代性理论基础的近代西方哲学的绝对迷信。但是，因为它只重消解，不重建设，所以虽能使人们清醒看到现代性的弊端，却引不起人们真正的兴趣。

于是，后现代主义的另一流派——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便应运而生。因此，我们可以把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看作是西方世界超越现代性的先声。相信随着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所揭示的现代性困境及其所提供的新世界观和克服现代性方略之合理性的不断显现，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理论必将在西方世界大放异彩。

另一方面，从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看，这种影响与作用就更加明显了。因为是后发现代化国家，西式现代化所具有的天然优势如资源因素等已经不复存在了，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再去复制一条西式现代化之路。更何况，西方现代性之恶果已经显现出来，重蹈覆辙毕竟不是明智之举。所以对后发国家而言，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必然要去寻求一种既实现现代化又能避免现代化恶果的全新之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这种时代需求恰恰正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所着重探索的主题和致力完成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关于后发国家如何更好地实现现代化的一种全新的指

导性理论。正因为如此，当两者相遇，恰如烈火与干柴，中国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必成燎原之势。因此之故，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最有可能在后发国家中首先发展成长。这也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看好中国等这样的后发国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之一。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上述发展成果则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结论。

写到这里，有人不禁会问，为什么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如此迅速地在中国生长、发展，而在其他国家则相对滞后？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去理解。一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具体主张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主张有着家族基因上的相近与共通，因而它在中国有着天然的生长条件与基础；二是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决定了中国必须找到一条既实现现代化又避免西式现代化的惨重代价的特色之路，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所探讨的主题就在于超越现代性，恰恰为中国现实所急需。因此，两者相遇，必然会结出预期的实践之果。这是一桩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美事。三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代表了人类哲学发展的一种必然方向。因为无论是从哲学发展的逻辑还是从人类发展的实践需要看，作为人类发展指南的哲学不能只解构而不建构，解构的目的恰恰在于建构。历史发展表明，人类面对问题的最好态度是创造性地建构，尽管这种建构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相反它只能在一个不断发展的无限的创造性过程中才能最终完成。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虽然目前它还没有成为西方哲学主流，但这种哲学因其符合人类发展，必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四是中美各方人士的不懈努力，也许这是最重要的原因。因为前述三点固然重要，但只表明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可能性，要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还必须要靠人不断殚精竭虑地“操心”与付出。在这里不得不提及以下三方面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重要人物与相关组织。首先是被视为中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运动发起者、组织者、传播者的著名旅美学者王治河博士和樊美筠博士，由于他（她）们十余年呕心沥血的努力，才使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大有成为一门显学之势，

而且在各个实践应用领域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他们在译介与出版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主要代表作，成立中国过程研究中心，组织相关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学术论坛，举办中美过程哲学暑期班以培养青年学者，以至组织相关学者到美国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大本营访问、进修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起了非常重要的关键作用。他们的《第二次启蒙》一书被学术界认为代表了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新进展，被认为其“使过程哲学具有了入世的品格”，从而“优化了过程哲学，推进了过程哲学”。^[11]

其次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大家，特别是过程哲学的第三代和第四代传人柯布先生和格里芬先生，以及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和美国过程研究中心的其他著名学者的大力支持，没有他们各方面的大力支持，这项工作也是不可能取得如此大的成绩。

最后是中国众多相关学者、领导独具慧眼、大力参与和精心组织。正是这三方面形成的巨大合力才促成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快速发展。

如前所述，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西方世界还不是主流，其原因是西方世界毕竟已经习惯了现代哲学机械性和线性的思维方式，因而还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对话与交流的过程。而在适合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生长的中国，虽然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在一定的实践层面上有所进展，但毕竟也还没有形成一种全民的普遍性意识和行动，因此，对于中国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来说，这仍然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好在希望的小树已经发芽，只要我们假以时日，精心培育，纤纤小树必将成为参天大树！

[11] 商红日：《探寻破解不可能世界的哲学——对话〈第二次启蒙〉》，《哲学研究》，2012年，第6期。

主要参考文献：

王治河、樊美筠著：《第二次启蒙》，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Herman E. Daly and John B. Cobb, Jr. *For The common Good* (Boston: Beacon Press, 1994)

[美]小约翰·B·科布著：《后现代公共政策——重塑宗教、文化、教育、性、阶级、种族、政治和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美]大卫·格里芬编、马季芳译：《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

[美]A·N·怀特海著、杨富斌译：《过程与实在》，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